
理论与应用

主体符号学的发展：理论、实践与展望^{*}

李 双

摘 要：巴黎学派是世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该学派早期以叙述研究为中心，将语言看成自给自足、逻辑自洽的系统，探索文本的话语表现形式和深层语义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在符号学的众多研究对象中，“主体”这个关键且复杂的问题都被悬置。通过借鉴陈述语言学和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凯对传统符号学采取批判性继承的办法，从现实性原则出发，探讨了主体符号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并创造性地将主体二分（主体/非主体）从而建立陈述机体模型，用于分析实践。主体符号学是后格雷马斯时代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为研究人的感知和身体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主体不再是模糊、抽象、难以捉摸的概念，它变得可以理解和分析，能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意义世界和自身提供帮助。

关键词：主体符号学，科凯，巴黎学派，现实性，陈述机体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e Semiotics: Theory,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Li Shuang

Abstract: The Paris School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global semiotic research. In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巴黎符号学学派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21YJC740028）阶段性成果。

its early days, the school focused on narrative research, viewed language as a self-sufficient, logically self-consistent system, and explored the expression and form of discourse, the deep semantic structure of tex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or a long time, among the many research objects of semiotics, the key and complex issue of the subject has been neglected. By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enunciation and phenomenology, Jean-Claude Coquet adopts a critical inheritance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semiotics.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he explore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subjective semiotic theory and creatively divides the subject into two (subject/non-subject)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enunciating instances for analytical practice. Subjective semiotics i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theories in the post-Greimas era, providing an effective tool for studying issues such as human perception and the body. The subject is no longer a vague, abstract, and elusive concept; now, it can be understood and analysed to help people further understand the world of meaning and themselves.

Keywords: subjective semiotics, Jean-Claude Coquet, the Paris School, reality, enunciating instances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17

如果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的出版为发端,欧洲符号学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索绪尔所预计的“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1980, p. 3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然成为人文领域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遗产。以格雷马斯(1917—1992)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继承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思想,将叙述结构和语义分析作为研究路径,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文本和话语的理论模型,广泛应用于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等学科。格雷马斯去世之后,学派内表面上分崩离析,实际却发展出多条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路径,如激情符号学、张力符号学、主体符号学等,大大促进了该学派理论的拓展和对不同话语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它们的核心和共同点是将被传统符号学排除在外的主体和情感纳入考察范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找寻探索这些主题的途径。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认知科学和话语研究的不断深化,主体、身体和经验等概念的探讨越来越多,主体问题自然成为国内符号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

题。考虑其在符号学体系中的奠基性作用,学者唐小林(2012, p. 100)就强调“建立主体符号学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关涉到这门学科(符号学)的现在和未来”。然而,探讨主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扯到很多方面,赵毅衡(2012, p. 131)甚至认为“主体问题是符号学领域中最困难的课题”。而在符号学诸流派中,巴黎学派较早关注主体的研究,主体符号学的设想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科凯(1928—2023)更是对该理论的系统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科凯的学生、旅法学者王论跃曾撰文《主体符号学》(1993),简要阐述了该理论的背景、基本原理和影响。科凯本人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演讲,讲座内容由王东亮整理并翻译,出版为《话语符号学》。遗憾的是,这些尝试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内符号学界的足够重视,或者说,主体问题此时尚未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加之科凯主体符号学理论融入大量现象学和陈述语言学的知识,为其传播带来困难。以1984—1985年科凯两部《话语及其主体》(*Le Discours et Son Sujet I, II*)出版为开始到2022年《言语行为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出版结束,科凯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为巴黎学派主体研究开辟了道路。本文尝试就主体符号学的原则模型、理论内涵、分析实践以及待解决问题等方面进行梳理研究,厘清该复杂理论的主要观点,希望为我国主体符号学的构建提供思路。

一、主体符号学的原则、模型与内涵

主体符号学(sémiotique subjectale 或 sémiotique du sujet)区别于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sémiotique narrative),是后格雷马斯时期巴黎学派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科凯将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称作陈述体符号学(sémiotique de l'énoncé),或为客体符号学(sémiotique objectale),因为格雷马斯的模型更重视陈述结果,忽视陈述活动,而陈述体必然是陈述活动的产物,没有陈述活动就无法谈及陈述体。因此,科凯另辟蹊径,研究陈述体的产生机制。

我们知道,经典符号学的基础是语言的内在性原则(immanence),即语言有其系统性,是自给自足、逻辑自洽的整体,从索绪尔到叶尔姆斯列夫再到格雷马斯,内在性原则始终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黄金法则。索绪尔(1980, p. 41)开创性地提出语言/言语二项式对立,认为要将言语的语言学与固有意义的语言学区分开,“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格雷马斯(Greimas, 2015, pp. 153—154)虽然也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存在非语言状

况的前提,但为了使文本客观化,就要将主体性的参数全部去除,包括人称、时间、指示和寒暄功能的范畴。而语言的内在性原则带来的问题是语义逻辑的客观封闭,一切文本好像都被事先存在的模型限定,如语义矩阵所展现的那样,失去了生命和灵魂。主体符号学不同,它以现实性(réalité)为根据,认为意指行为与话语主体的个人经验息息相关,而话语主体扎根于现实之中,通过陈述(énoncer)、自述(s'énoncer)并且自我确认(s'affirmer)产生意义,因此意义围绕着主体而存在。这一观点当然也有其语言学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隆代尔、雅各布森:虽然他们同样是20世纪结构主义浪潮中的代表人物,但他们都强调动态研究,关注语言结构之外的“具体材料”“主体间性”等。最为重要的是,在“布拉格雅各布森和哥本哈根布隆代尔为代表的动态结构主义过去几十年后,1970年前后陈述活动语言学继续这方面的探索”(Coquet, 1997, p. 240),即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主要贡献,以论文《陈述的形式配置》(L'appareil formel de l'énonciation)为代表。科凯正是在本维尼斯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主体符号学的理论构架。科凯(Coquet, 1997, p. 243)认为,“现实性是无法被排除在外的实体;它也不能概括为与世界对应的参照物或意向对象。它是嵌入在言语行为中的实体。换句话说,言语行为分析只有在与现实性被认为是互相渗透的实体时才会恰到好处”。现实性原则是主体符号学区别于叙述符号学的重要标志。

主体事实上一直都是符号学模型中的构成要件,但是一般行为者模式中主体与客体是作为一组对立项而存在的。主体对客体的获得和失去构成叙述转换程式,衔接后形成序列,此时的主体是逻辑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从分离到合取是语义逻辑默认的,也是叙事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主体一般从发送者那里领取任务,为了达到与客体合取的目的,主体需要经受“三重考验”,即资格考验、核心考验与荣誉考验。考验过程中会有协助者和阻碍者的出现(格雷马斯后期将协助者和阻碍者都看成主体获得能力模态的形象化表现),最终主体根据任务完成与否获得荣耀或接受惩罚。因此,内在性原则主导下的主体虽然也是文本中的主要行为者,但它为叙述图示所限制,它们只是完成重复性的程式(programmes répétitifs)(Coquet, 1997, p. 41)。主体符号学为了区别于叙述符号学,在具体操作层面也构建了自己的行为者模式,称作陈述机体模型(instance énonçante,又译“陈述时位”),其中主体(sujet/non-sujet)为第一行为者,客体(objet)为第二行为者,具备指令功能的发送者为第三行为者。主体占据核心地位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包含主体和非主体两个身份。客体是围绕主体而存在的世界,与传统叙述符号学视

角下的客体一致，而指令体类似于发送者，是主体无法控制且会对主体施加影响的力量，可以是来自主体身体内在（*destinateur immanent*）的激情与冲动，也可以是诸如社会规范的外部超验元素（*destinateur transcendant*）。

主体与非主体的二分是科凯最具里程碑式的贡献，它不仅解决了主体复杂性的难题，也为主体性的研究找到了着力点，因为我们可以划分出主体理性存在和其功能性和激情存在的不同身份，它们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具备判断能力。要想理解主体符号学，就必须厘清主体和非主体的区别和联系：从话语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与非主体相关的是“说谓”（*prédication*），属于主体特性的是“说论”（*assertion*）。科凯对此的解释是：“非主体说谓但不说论，这是声音建筑的表意方式。主体合并这两项功能，这是人重述并估价他自己身体经验的表意方式。”（p. 6）说谓与身体息息相关，这是非主体最明显的表现，说论却与人的认知不可分割，话语主体此时表现为话语行为的承担者。非主体因此也是身体述体，它通过身体来显露内心情感，并不做出判断，也无需对论述和行为负责，而主体是理性的，具有判断能力，是思考主体。非主体和主体融汇归一，在时间上展开。以激情的体验为例，非主体能够感受却无法控制激情，而主体作为理性存在，能够保持判断，不被身体体验完全占据。对于非主体和主体的观察和确定必须从身体和理性的角度出发，而这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体从本质上讲拥有对‘感官的控制’，但它并不总是时时刻刻、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让人知道它是（感官的）主人”（p. 8）。

需要厘清的是，虽然主体具备判断能力，是理性的代表，但在与非主体的关系中，后者是居于第一位的。因为，作为身体陈述的非主体的体验在前，而主体的判断在后，身体展示（*présenter*）体验，主体再现（*représenter*）体验。体验因此在陈述活动中至关重要，“‘人在言语行为中陈述自己的体验’或是陈述感知到的他人的体验。因此陈述活动第一个相关特征就绘出了：通过言语行为，我们（‘我们’是有待确定的陈述机体）使自身体验被知晓，同时还有我们的身份，个人的和社会的，身体体验在前，认知体验在后”（Coquet, 2016, pp. 131 - 132）。作为陈述机体，非主体感受激情，主体承担判断，这决定了话语的顺序是意义的侵入（*invasion*）在前，意义的控制（*maîtrise*）在后。科凯进一步明确：“‘侵入’证实着一个话语陈述体的出现，该陈述体具有一种力量，其表现形式是双重的：外部与内部、超验与内在；所说的控制证实着具判断力的第二个话语陈述体即‘主体’的存在。”（高概，1996，p. 6）借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身体的‘我能’先于人格的

‘我思’，它位置在先并且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意义的物质构架。”（高概，1996，p. 6）主体只有在非主体让位时，才会体现出来，展现出对意义的把控，即“主体陈述体只有在经验时间以后的一刻才以准时判断行为的方式亲身参与进来”（p. 9）。激情结构的示例告诉我们，“话语陈述体是双重而不是单一的。它听命于内在力，其次才是超验力。最后，它还可以在时间上展开，首先是非主体，然后是主体”（p. 8）。

主体符号学中占据第三位的指令体（tiers actant）也与格雷马斯行为者模式中的发送者有区分，如前所述，它包括内在和外在两种类型，是主体无法抗拒的力量。科凯（Coquet，2022，p. 44）在解释的时候表示：“为什么被称为‘第三位’呢？因为它是作为对话双方‘我’和‘你’之外的。为什么是‘内在的’？因为它在对话双方身上施加了内在力量，既不可逆转也抑制不住。”内在指令体（tiers immanent）以激情、冲动为代表，它虽然源自我们自身，却是身体无法控制的力量，科凯认为在法语中其典型代表就是代词ça（这个、那个），它调节言语身体（corps parlant）的行为，正是这个ça言说着真。这与心理学的观点一致，因为ça也是弗洛伊德无意识下的本我，是被压抑的人的本能和欲望。同样的，与内在指令体对应的是超验指令体（tiers transcendant），之所以“超验”，是因为“它对对话双方施加了外在力量，既不可逆转也抑制不住”，其典型代表有宗教话语、律法、规范等。科凯举了加缪笔下的加里古拉（Caligula）为例，当他只是王的时候，只不过是统治者，他的权力是可逆的，他的话语是可以被质疑的，但当他宣称进入超验的世界“我主宰命运”（Je me suis fait destin），他就摆脱或如同摆脱了人类历史年轮的限制。（Coquet，2022，p. 45）从作为王的世界进入成为神的世界，因而其权力的性质改变了（2007，p. 179）。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巴黎符号学派建构了以叙述语法和语义分析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叙述性（narrativité）成为符号学最为有效的切入点，描述和呈现抽象的“叙述结构”成为理解意指行为的主要方式，并在人文学科中被广泛采用。而科凯认为欧洲符号学传统中，与作为范式的叙述性一起的还有话语性（discursivité），主体符号学即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他指出，在索绪尔的一系列二项式对立中，如语言/言语、社会/个人、陈述句段/陈述活动等，第二项总是被忽略的，可以用“话语”统称这些术语。“话语并不是语言（或系统、纯图示），而是为其提供实质的支撑和形式模型（话语赋予语言以形式）；话语不是言语，因为它并不与某个个人相关，而是与任意个体呈现自己的特殊行为有关系。”（Coquet，2007，p. 175）将研究的对象确定为

话语，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因此主体符号学将重点放在了“陈述机体”这个概念上，即话语和陈述机体的关系，后者是话语的生成、组织和调节中心。陈述机体研究的重点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它回归到了那个“生产意义却不一定非要采取行动的机体。其中心就是身体：言说的身体、忍受的身体、激情的身体、行动的身体，体验的身体，等等”（p. 176）。

在科凯（p. 178）看来，传统符号学脱离了现实性原则，也没有区分说谓和说论的关系，其“目的是依赖‘第三人称纯粹且单薄的形式’即‘他’（il），因此抛弃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形式即‘我、你、我们’（je, tu, nous）”。当文本以第三人称“他”为核心，就构成了一个“欧几里得般的、同质的、无穷的空间”。话语符号学则不同，文本空间不是欧几里得的，而是拓扑学的，“它并非一个纯粹的汇集处，而是一个‘以我为起始的空间，就像空间的起点或零度空间’，是以陈述机体为中心的空间”。在时间方面，每个机体有自己的时间性，主体嵌入现在时中去感受和体验，并以此为中心参照构建过去时和将来时。传统符号学中的第三人称（il）此时也让位于第一、二人称（je/tu），因为 il 是投射述体，是被客观化的时位，而本源述体是 je/tu，文学作品是本源述体通过投射述体构建逻辑学范式中的叙事，而本源述体是现象学范式的，“逻辑学的范式是现象学范式的一个外射”（高概，1997，p. 29）。通过探讨话语中投射出的陈述主体和非主体以及作为话语的产出者和接收者的本源体和接收体，主体符号学走出内在性的支配，主体也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在今天看来，科凯的主体符号学理论其实是一门“言语行为现象学”，这个名称也是他所青睐的核心术语，是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之后又一身份即现象学家的最好体现：如果说1997年结集出版的《意义的探寻：言语行为问题》（*La Quête du Sens: Le Langage en Question*）依旧将意义作为关键词，而“言语行为问题”只是副标题的话，那《自然与逻各斯：言语行为现象学》（*Phusis et Logos: 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 2007）和《言语行为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 2022）就逐步以现象学的姿态展开，并将 logos 和 phusis 作为一种新的范式。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logos 的作用和重要性被人们普遍接受，而 phusis 却并非如此，作者试图向读者厘清 phusis 与 logos 的关系，并强调 phusis 的基础作用。“只重视思维或作为它语言支撑的 logos，就是将 phusis（亦即‘自然’）的基础作用排除在外，也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基石’。言语行为现象学中 logos 是 phusis 的终点。按照这一观点，两个层面的接合是最为重要的。”（Coquet, 2007, p. 5）接合意味着 logos 不是

孤立的，它反映 *phusis* 的世界。既然二者都属于言语行为的内容，那如何去辨别它们呢？科凯发现，谓词的使用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和区分 *logos* 与 *phusis* 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认知谓词属于 *logos*，涉及思维再现，而身体谓词属于 *phusis*，涉及知觉和身体体验。在二者的关系中，“身体谓词（或现实谓词）言说感觉，而认知谓词描述世界。‘言说’（*dire*）并不是‘描述’（*décrire*）”（2022，p. 42）。如果放在时间链上，身体谓词在前，认知谓词在后，因为 *phusis* 层面存在于 *logos* 层面之下，处于基础地位，一切思维都依赖于身体，之后再借助语言组织成为形式（即 *logos*），描述对于现实（即 *phusis*）的体验。“如梅洛－庞蒂所说，‘存在首先是 *phusis*，先具备出现并显露的能力；然后它才再现出来’。言语行为现象学家的任务就此绘制：他的分析应该依赖我们称之为‘身体’的谓词和认知的谓词，前者使他能够进入 *phusis*，后者使他进入 *logos*。”（p. 85）

二、主体符号学实践

我们知道，叙述符号学之所以能够在结构主义浪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巨大，源于其实效性、可操作性，其模型能够广泛应用于不同类型的话语和文本，如格雷马斯对莫泊桑小说的经典案例分析，弗洛什（Jean-Marie Floch）对广告等视觉艺术的分析，麦茨（Christian Metz）对电影符号的分析，里昂符号学小组（Groupe d'Entrevignes）对《圣经》的分析，等等。主体符号学亦不例外，其理论的合理与否需要通过具体实践来检验。科凯是语言和文学专业出身，文学符号学是其理论最主要的试验场，杜拉斯、瓦莱里、普鲁斯特、兰波是其最为青睐的作家。

《话语符号学》中科凯对杜拉斯作品的经典分析让我们看到，该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杜拉斯的创作手法以及作家独有的意义世界。科凯（高概，1997，pp. 32 - 33）认为“符号学的研究目标是理解表达意义的不同方式，即我们如何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及我们自己以意义”。为了认识世界和我们自身，需要“符号学所依据的文本”，并“尽力收集能让我们准确理解意义的所有材料”，而最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身体，它是表意的关键因素，“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登录、嵌入于空间之中并与时间发生关系的”。科凯认为，一般文学创作的虚构与真实世界没有很大区别，虚构说明“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称作虚构的投射世界之间有一种差异”，而杜拉斯认为“没有虚构世界。她愿意留在真实世界之中，不与真实世界即身体切断联

系。”(p. 35) 具体来看, 作家在创作中是本源体, 先投射一个叙述者, 后者又作为本源体投射出小说人物, 最后到达作为接受体的读者。作家创作时是将一个经验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在本源体和文本之间, 有着“现实的关联”(p. 37)。科凯将《副领事》中人称代词的使用作为例子, 主人公查理·罗塞是意义产生体, 指代他的人称代词不断变化, “on, nous, ils, je”, 它们都是罗塞在确定的世界中表达自己的方式: 法语中, 代词 nous 是“我们”, ils 是“他/它们”, je 是“我”; 代词 on 比较复杂, 既可以表达泛指“人们、大家”, 也可以表达明确的“我、你、他/她、我们、你们、他/她们等”, 其灵活的语义恰恰反映了一种不确定性。

作品中, 仆人为了叫醒睡梦中的罗塞, 说道“先生该起来了”, 这里是第三人称, 突出对客体的感受, 其附着的并非自己的感觉, 而是他人的。紧接着罗塞在半睡半醒中“睁开眼睛, 忘记了, 就像每天下午一样, 忘记了是在加尔各答”(on ouvre les yeux, on a oublié, comme chaque après-midi, on a oublié Calcutta), 人称代词是 on, 并非指称自己的第一人称(je), 如科凯所言, 它的使用“反映了一种非确定的感受、一种对尚未确定的世界的感受”(p. 45)。这种方式表明一个人在半睡半醒的模糊状态中, 光线还没有进入房屋, 主人公被尚未得到辨识的世界笼罩着。然而, 等到“‘房间里进入了令人眩目的反射的光线, 随着光线而来的是恶心’”, 此时主人公给大使打电话, “大使先生, 我请求换个地方, 我不能, 我不能适应加尔各答”(p. 47), 这里使用的是明确的第一人称“我”, 叙述由此进入日常生活, 进入罗塞个人的主体世界, 它是主体的感觉。整段叙述都在人称的变换中进行, 我们跟随身体进入意义世界, 在主人公睡与醒的状态中, 我们看到意义世界怎样通过人称建构起来, 因为每个代词都属于不同的维度, 有时是主体世界, 有时又是客体世界, 而有时界限又很模糊不清。科凯这里的分析可以看作对本维尼斯特人称代词分析的接受和承继, 因为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中, 作者强调第一人称(je)与其他代词的不同, 它不仅是语法上的一个形式和功能范畴, 它和第二人称(tu)构成与现实相关的“人”(personne), 本维尼斯特(2008, pp. 293-294)如此解释: “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Est ‘ego’ qui dit ‘ego’)。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主体性’的根本所在, 它是由‘人称’的语言学地位确定的。……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称为‘我’。”

主体符号学另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领域是行为心理学, 代表人物是伊万·达罗-哈里斯(Ivan Darrault-Harris)。达罗-哈里斯从20世纪80年代即

开始倡议建立心理符号学，主要利用格雷马斯的叙述语法对心理语言进行分析，但诚如他承认的，“在心理符号学领域，其研究主要依赖治疗过程中关系方的话语分析，而仅仅依赖客体符号学即陈述语段，遇到了瓶颈（障碍）”（Costantini & Darrault-Harris, 1996, p. 21）主体符号学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呢？达罗－哈里斯指出，在临床上，通过对病人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分析来确认其主体和非主体身份能否正常转换，可以确认心理诊断的合理性。在治疗方面，陈述机体理论不仅能在治疗过程中评估病人话语的可能变化，对于治疗关系双方即治疗师和病人的研究也有助于提出真正有治疗效果的陈述行为原则，同时更好地对治疗人员进行培训。具体实践上，达罗－哈里斯与心理学家克莱因（Jean-Pierre Klein）在《构建一种椭圆精神病学——基于创作主体的探索》（*Pour une Psychiatrie de l'Ellipse: les Aventures du Sujet en Création*, 2007）中结合主体符号学的学理基础提出了“椭圆理论”^① 用于心理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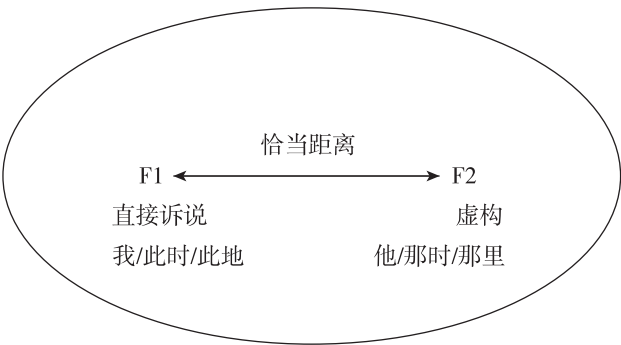


图1 用于心理治疗的椭圆理论示意图（Darrault & Klein, 2007, p. 251）

椭圆理论来自几何学现象：当我们将一个圆投射到一个斜面上，原本的圆心会分裂成两个中心（分别用 F1 和 F2 表示），圆周轮廓也由原来的圆形变成椭圆形。患者作为痛苦主体，需要在 F1 上直接说出自己的问题所在，在 F2 上，主体在保持“恰当距离”（bonne distance）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问题转移到虚构之中。在第一个中心 F1，病人通过直接诉说（diction）的方式进行话语呈现：主体在陈述模式上处于“我/此时/此地”的位置，诉说自己的问题、痛苦和病症，这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如定期举行的心理咨询，以此调整治疗方式。在第二个中心 F2，主体在医疗人员的指示下将自己 F1 的问

^① 关于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可参考达罗－哈里斯为安娜·埃诺主编的《符号学问题》所撰写的《行为表现符号学》一章（2019, pp. 285－299）。

题转移到虚构（fiction）的模式上，创造出适当的距离并动员“他/那时/那里”的陈述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患者的问题通过不在场的方式表达出来，缓解了第一人称表述时医生与患者间的紧张关系。虚构模式下，主体行为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目标是等待患者通过虚构的投射辨认出自己。换言之，通过确认，找到自己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份。之后，主体无需虚构模式的帮助，就可以回到“自己”独立主体的地位，对自己的问题、症状进行把控，并与其分离，从而起到治疗效果，此时，治疗者也就可以退出了。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即诉说和虚构的转换，尤其在治疗过程中，完全是主体性的。两种模式分别属于主体分化的两种身份即主体和非主体，二者是话语中心，通过二者关系的调整，医生对患者进行治疗。此时，需要关注的并不是病人陈述语段的实质内容和表达，那是客体符号学所关注的内容，陈述语段只是判断陈述机体属于何种身份（主体/非主体）的参照。因此，我们看到，用于心理治疗的椭圆理论充分借鉴主体符号学的陈述机体模型，其新颖之处在于它并非直接对文本或话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进行研究和分析，而是在操作上直接对人的行为和实践进行修复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符号学所应用的范围。

三、展望

得益于主体符号学的发展，我们看到，主体不再是模糊、抽象、难以捉摸的概念，主体和主体性研究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更加注重思考和认知在建构主体时的作用，身体一直被忽略，主体符号学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它在表意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身体先于思考，先有身体的体验才有理性的判断，所以从现实性出发，从处于话语中心的身体出发，才能够更加贴近真实的语言行为和语言现象。叙述论符号学关注陈述结果，以封闭和客观化的文本符号为对象，而主体符号学研究的是陈述活动，具有连续性和拓扑学的特征，这些现象与生产和阐释它的具体陈述机体不可分割。因此，主体符号学无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认识论，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空间，可以对叙述论符号学进行有效的补充，探究主体和主体性等传统符号学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对于主体符号学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并深化：

第一，借鉴消化，普及应用。主体符号学作为陈述理论和现象学下发展起来的分析手段，对于文学分析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对于语言现象

复杂的现当代文学来说,陈述结构往往相互缠绕,单纯的内在性分析无法窥探文本建构的全貌,而陈述机体模型以及主体的二分作为独创的理论贡献,丰富了我们理解和剖析文艺作品的工具箱。主体符号学在心理治疗等方面的应用让我们看到符号学能够跨出人文学科的领域,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面发挥功效。然而,相较于叙述符号学广阔的实践领域,主体符号学亟须进一步证明其一般性并扩大应用范围,因此必须将普及该理论的知识作为重中之重。我们只有充分吸收和掌握了主体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尝试和推广其在更多领域内的应用,诸如探讨当今复杂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以及面对人的发展问题。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主体身份渐渐被削弱甚至消解,如何借助主体符号学来强化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是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融会贯通,方法互补。主体符号学的建立基础可以说是对客体符号学即格雷马斯理论的质疑和否定。从内在性到现实性,从逻辑语义到现象学,从不连续性到连续性,从陈述语段到陈述活动,等等,主体符号学每一次的迈步都是对原有的叙述符号学的挑战和颠覆。这种有“侵略性”的理论建构也对科凯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凯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被冷落和被巴黎学派质疑“背叛”的艰难岁月。主体符号学与客体符号学的确存在认识论上的距离,但是,是否有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二者真的是水火不容甚至相克的范式吗?如果说主体符号学的陈述机体类型和现象学分析手段更加突出陈述活动即主体性问题,那不正是对格雷马斯传统叙述论符号学的有益补充吗?二者可以放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汲取营养,各自对复杂的语言活动进行考察和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意义活动的理解。科凯晚期也试图将自己的符号学构想重新纳入经典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至少让二者可以共生共荣,诚如丰塔尼耶(Fontanille, 2023-01-30)注意到的,“科凯符号学理论变成了陈述机体符号学,其‘主体’的特点退居次要地位,以便重新回归到结构论符号学来”。因此,如何将主体符号学与传统符号学融会贯通将会是未来符号学家们的重要工作。

第三,对比研究,发现自我。科凯虽开创了主体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先河,但他的理论带有明显的欧陆色彩,它植根于亚里士多德、梅洛-庞蒂、本维尼斯特等人的哲学、现象学和陈述语言学理论,对于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启发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既要从中探寻其一般符号学的意义,也要区分其在典型文化中的应用性。当下符号学发展如火如荼,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主体研究的路径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与巴黎学派主体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起步不同,美国学者皮尔斯从一开始就把人的因素纳入符号学的框架,在“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关系中突出解释者对符号意义建构的作用,因此,对欧美两种符号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刘艳茹,2016)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把握主体符号学的研究方向和路径,从而推动主体符号学研究的本土化。当然,想要构建我们本土的主体符号学,还需要结合我国自古以来的符号学思想,从前人先贤那里理出一条主体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为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中国视角。这自然而然的是摆在我国符号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和挑战。

引用文献:

- 本维尼斯特,埃米尔(2008).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达罗德-哈里斯,伊万(2019).行为符号学,心理符号学.载于安娜·埃诺(主编).符号学问题(怀宇,译),272-29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高概,让-克罗德(1996).现象学的力量——激情的话语分析(王东亮,译).国外文学,3,3-12.
- 高概,让-克罗德(1997).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艳茹(2016).主体符号学的认知维度.学习与探索,9,33-36.
- 索绪尔,费尔迪南·德(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唐小林(2012).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学术月刊,4,100-103.
- 王论跃(1993).主体符号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4,8-13.
- 赵毅衡(2012).符号学与主体问题.学习与探索,3,131-134.
- Coquet, J. -C. (1997). *La Quête du Sens: Le Langage en Ques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Coquet, J. -C. (2007). *Phusis et Logos: Une 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 Coquet, J. -C. (2016). Quelques Repères Historiques pour une Analyse de l'Énonciation (d'Aristote à Benveniste). *Littérature*, 3, 129-137.
- Coquet, J. -C. (2022). *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 (Costantini, M., & Kharbouch, A., Eds.). Limoges: Éditions Lambert-Lucas.
- Costantini, M., & Darrault-Harris, I. (Eds.) (1996). *Sémiotique, Phénoménologie, Discours: Du Corps Présent au Sujet Énonçant*. Paris: L'Harmattan.
- Darrault-Harris, I. & Klein, J. -P. (2007). *Pour une Psychiatrie de l'Ellipse: Les Aventures du Sujet en Création*.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 Fontanille, J. (2023-01-30). Jean-Claude Coquet, le Subjectal et l'Objectal. Retrieved

□ 符号与传媒 (29)

from <https://www.unilim.fr/actes-semiotiques/7968>.

Greimas, A. J. (2015).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作者简介:

李双,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语言学与符号学。

Author:

Li Shuang, Ph. D.,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rench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Email: alain0629@126.com